

# 我国新常态视域下的绿色经济发展探析

林昕瑶,宫恩康,方 哲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作为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绿色发展将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优化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社会平衡发展。针对新常态下我国在绿色转型中遇到的如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生态环境遭严重破坏、能源消耗率高、环保信息不公开、民众绿色意识薄弱等问题与障碍,提出应对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完善绿色政策机制、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加速产业绿色化进程,加强绿色创新技术开发与拓展国际绿色合作等具体措施推进我国绿色转型,确保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常态;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D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8)01-0078-09

伴随着后危机时代的来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世界各国均面临经济复苏缓慢、能源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一直以来以化石燃料为主的“黑色经济”已严重危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生态系统,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且极大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全球能源、粮食、经济、金融及环境等多重危机面前,传统的以要素和投资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各国纷纷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与新的发展动力,“绿色经济”发展理念正是在全球产业转型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强烈要求下应运而生,并很快被国际社会接受和倡导。自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下行,经济中高速增长已成为“新常态”,在此背景下,我国学者纷纷倡导应遵循“绿色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机制。作为新兴的经济大国,中国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不仅是我国在“新常态”下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和谐统一发展的必然选择,还将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sup>[1]</sup>。

## 一、“绿色经济”概念的提出

“绿色经济”这一概念最初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于1989年提出。他所推崇的是一种“可承受经济”,即主张从社会生态和环境保护视角出发,综合考虑全人类福祉,保护能源和生态环境、注重社会公平与发展经济并举,在自然可承受范围内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sup>[2]</sup>。2009年,G20峰会在伦敦召开,各国领导人达成了“绿色及可持续经济复苏”的共识。各国旨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绿色发展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对各产业进行绿色升级,加强绿色投资、开展一系列绿色活动,致力使本国经济得到复苏及长足可持续发展,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发展绿色经济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提升国际综合竞争力。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在《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

收稿日期:2017-06-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耕地保护中的土地发展权机制创新的实践与理论研究”(15BJY080)

作者简介:林昕瑶(1989—),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一文中提到,绿色增长是一种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又避免环境污染、保留生物多样性以及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方式。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绿色发展问题的系列讲话中提到:要大力推行绿色发展,以绿色发展理念作为指导思想来促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以上倡议得到了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许多国家已经将绿色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争先出台各项有关绿色经济及绿色发展的政策措施和具体实施方案。在这种全新的模式下,对财富的追求和对发展的渴望无需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为代价;可以说,绿色经济是原来以破坏生态系统为代价的“黑色经济”模式失效的必然结果,也是替代“黑色经济”模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新产物<sup>[3]</sup>。

## 二、新常态下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飞跃性发展且涨幅明显,国民收入水平长期超过10%,1991-2007年间GDP一直保持在稳定水平(见图1)。但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国民收入水平逐步下降,GDP增速一直低于10%。对于这一新的经济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专门提出:“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呈现中高速稳健增长的态势,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新常态。”<sup>[4]</sup>在经济新形势下,以生产要素为驱动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并不可行,过去“高消耗、高投入、低效率、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急需转变,中国经济需要“换挡”“松油门”。因此,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体现,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经之路。中国经济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跃迁和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sup>[5]</sup>。新常态下助力绿色转型、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社会平衡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实现我国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和谐统一的必经之路。



图1 我国1953-2016年GDP同比增长统计图

数据来源:前瞻数据库 <http://d.qianzhan.com>

### (一)绿色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传统的经济发展是通过无节制消耗资源和破坏自然环境的方式来实现,此种方式造成十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如土壤贫瘠、气候变暖、大气污染等问题,极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3年9月,习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谈到环境问题时指出:“我们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共中央十八大提出:要树立“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

然”的新理念,就是要在全社会领域内倡导生态平等的新观念。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有着相类似的概念,二者都主张生态平等的价值观,包括人与自然、社会及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相融发展、当代人与后人之间的和谐平等。生态文明建设其实质就是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为后人“乘凉”而“种树”;就是不给后人留下遗憾而是留下更多的生态资产。它是党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新认识,也是我国领导人提出的崭新的资源观。绿色发展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不冲突;相反,在生态文明时代,自然资本成为当代最稀缺的要素,需要被合理地保护和利用,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绿色经济发展摒弃了传统的以牺牲自然资源与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相融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形式<sup>[6]</sup>。因此,绿色发展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还能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全面实现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 (二)绿色经济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的根本途径

经济增长方式要发生转变,就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即从过去“高投入、高能耗、低产出、低质量”的“黑色经济”发展模式走出来,以绿色创新驱动模式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否则,“黑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持续将导致一系列如环境污染、能源浪费、产品质量低下、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但是,受制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管理模式、工业流程、消费方式和政府业绩考核等原因,要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分困难。其必须首先对我国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尤其要对工业进行绿色转型。目前,我国的主导产业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科技含量低,只有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发展战略创新、新能源、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才能在经济下行的后危机时代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优化投资和贸易结构,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sup>[7]</sup>。

### (三)绿色经济是我国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客观需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一方面积极发展绿色经济以复苏经济,另一方面,在气候、环境和资源能源等问题上不断给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面对环境气候等问题,国际社会强烈要求中国主动承担责任,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来应对这些危机。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环境条约、碳交易协议和绿色贸易规则等一系列政策给我国的贸易出口带来极大阻力,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还提出“中国威胁论”。可以说,不达标的产品质量、巨大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给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加之我国的产品生产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加工环节,科技创新能力弱、外部依赖性强、产品附加值低、污染排放率高,这些已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不可避免的问题,其不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威胁到我国的国际信誉和综合竞争力。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就必须创新机制体制,实行绿色经济转型,走绿色发展道路,优化资源配置,合理分配生产要素,创新组织管理方式,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加大对新能源、生物、光伏等新兴绿色产业的投入,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积极应对国际社会挑战,以期迎来新的经济增长高峰,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sup>[8]</sup>。

## 三、我国绿色经济转型遇到的障碍

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相继倡导发展绿色经济,旨在后危机时代复苏经济,寻求经济增长的突破口。我国虽在经济转型阶段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然而在绿色转型中却遇到诸多瓶颈和障碍,如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生态环境遭严重破坏、能源消耗率高、环保信息不公开、民众绿色意识薄弱、发达国家频设关卡等。

### (一)法律政策体系仍不完善,阻碍绿色经济顺利转型

过去30年,我国采取的是以资源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态势。通

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转变为“世界工厂”,经济持续腾飞,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该模式也给环境和资源带来巨大压力,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就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转型挑战。一方面,我国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考核标准一直以GDP为导向,一切绩效均以GDP为硬指标,唯“GDP论”使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继续存在,环境能源保护及绿色发展难以落实。另一方面,相关的绿色法律法规体系缺失且落后。目前,我国已颁布的环保法规不在少数,如《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执法手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节约能源法》等将近50部法律法规,是世界上颁布环保政策法规最多的国家。然而,由于这些政策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主要强调的是行政管理手段,并未从市场调节、民众监督、经济刺激等方面来激励大众自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加之相关法律在内容过于笼统、简单,缺乏配套的操作程序,大多是“纸上谈兵”,执行和操作性不强。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现存的环保及绿色法律法规已完全不能满足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要求<sup>[9]</sup>。

### (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非市场化,且内需疲乏,绿色推广难以普及

首先,许多能源要素如水、土地和矿产等价格被严重低估,非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很可能将能源要素价格排除于企业“成本-效益”模式之外,造成要素价格与其价值的扭曲。这使得新兴绿色产业在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产业面前竞争无力,甚至造成“绿色无效益、循环不经济”的被动局面。其次,传统产业仍占据主导地位,光伏、生物、纳米、新能源等以绿色、低碳技术为标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技术不成熟、经济增长方式未改变、仍然依靠传统主导产业等原因,导致其有价无市、内需疲软,在国内市场还无法与传统产业相竞争。因此,绿色新兴产业大多走“以出口拉动发展”的道路,相关研究显示,生产每千瓦时光伏发电的成本需铁约7300 mg、铜330 mg、铝土矿2800 mg、生石灰15000 mg,其生产环节本质上仍属于高能耗、高污染。按照此种模式,其结果将是加速国外新能源生产转型的同时加剧国内资源能源耗费及污染<sup>[10]</sup>。

### (三)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环境信息不够公开

在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严峻的环境与能源问题,如大气污染严重、水土流失、耕地资源贫瘠、土地沙漠化加速、淡水资源匮乏等。不仅如此,我国的环境信息过于封闭,不够公开透明,环境信息化水平相对较低,导致企业脱离公众和市场监督,继续生产高污染、高能耗产品,这就必然引致环境进一步恶化、资源能源无节制耗费。当前,许多国家都已纷纷把信息公开化作为一项制度全面推行<sup>[11]</sup>。在发达国家,环境信息公开化程度很高,公众更愿意选择那些环保、绿色产品。正是由于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因此企业都纷纷生产环保产品,投资者也倾向于选择那些环境绩效良好的企业进行合作。可见,有了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市场的正向监督和投资者的投资倾向就可以对企业进行良好的引导,信息公开化也就高效助力了环境问题的解决。

### (四)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在国际社会遇阻

过去三十多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延续着发达国家的老路,即“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承载率最高和环境风险最高的国家。当前我国的生态承载率高达15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之多;空气质量不达标的的城市高达2/3,华北地区雾霾天气呈现常态化;农村的环保设施差,远低于合格标准。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05—2015年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成倍增长,进口量由2005年的269.52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015年761.14万吨,涨幅高达近300%;一次性能源消耗量不减反增,其背后存在着巨大的能源危机,生态环境也面临着极大压力(见表1)。不难发现,我国经济发展仍是以大量消耗钢材、水泥等材料来支撑,我国的能源消耗量高达37亿t标煤,能源结构尚未优化,钢铁消耗量占世界总消耗量的44%、水泥占53%。2010年,中国GDP仅略高于日本,但日本仅消耗钢材1亿多吨,我国却消耗钢材6亿多吨,是日本的6倍;且我国人均消耗钢材已达到456千克,超过了世界人均钢材消费量,但

所创造的价值却远低于发达国家。此外,煤炭依然是我国能源消耗主体,我国的煤炭消费占全球总量的70%,高出全球煤炭平均消费水平的30%多,而在新能源方面的消费却远远低于全球水平。对外能源需求呈持续增长趋势,其中石油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0%<sup>[12]</sup>。巨大的能源消耗不仅使我国可持续发展进程受阻,发达国家也纷纷对中国表示谴责,并强烈要求中国须以大国身份来积极应对并承担责任。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一系列绿色贸易壁垒及贸易保护措施,如实行绿色关税、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绿色补贴等,对进口产品不分国别一律采取非常严格的标准,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大量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加之标准的实行常常内外有别,明显带有歧视性规定,以绿色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这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贸易出口,也使我国有可能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局面。

表1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及进出口总量情况

单位:万吨

时间	能源消费总量	能源消费 总量:工业	可供消费的能源 总量:进口量	可供消费的 能源总量:出口量	可供消费的能源总量: 一次能源生产量
2005	224 682	159 492	269 52	114 47	205 876
2006	246 270.15	175 136.53	30 421.02	-10 276.1	221 055.55
2007	265 582.99	190 167.29	34 033.84	-9 620.73	235 445.4
2008	285 000	209 302.12	36 764	9955	260 552
2009	306 647	219 197	47 313	8440	274 619
2010	324 939	231 102	55 796	8845	296 916
2011	348 002	246 441	62 261.52	-8 447.07	317 986.29
2012	361 700	252 463	66 598	7375	331 848
2013	375 000	291 130.63	73 420.4	8 004.77	358 783.76
2014	425 806.02	295 686.44	76 345.56	7 203.89	361 865.69
2015	429 905.09	292 276	76 114.18	8 688.77	361 475.51

数据来源:前瞻数据库 <http://d.qianzhan.com>

## 四、政策建议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基于特定国情,针对自身发展情况来采取不同政策和具体实施方案,做到绿色经济发展多元化、实现形式具体化。总体来说,重点在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实施激励政策,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推动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绿色发展合作。应通过培育新兴产业、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来增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sup>[13]</sup>。

### (一)建立完整的绿色发展机制体系,使绿色经济制度化

我国应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都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保障。首先,我国应遵循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和特殊需求,不断更新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条例,以立法的形式将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纳入可持续发展体系法制化轨道中。在完善制度建设时,我国还应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同时对公众的消费加以规范。其次,政府应摒弃过去唯GDP的考核标准,引入绿色GDP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提高政府官员的绿色发展意识,引进并扶持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最后,要真正地落实相关的环境保护政策条例和执行手段,不能再“纸

上谈兵”,各职能部门应相互协作,并结合市场调节、公众监督和经济刺激等手段唤醒各阶层的绿色环保意识。

### (二)实施激励政策,促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使绿色经济市场化

我国在发展绿色经济时应着重加强政策导向功能,实施一系列激励政策,如通过税收政策、投资导向政策、产业政策等引导和支持绿色循环经济的发展,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首先,财税部门应对节能环保、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税赋优惠、税赋减免和贷款优先等政策,由计划性的政府投资拉动转为自发地市场导向性选择;并对高污染、高能耗产品扩增税收,如征收新材料税、垃圾税和生态税等来促进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其次,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最后,价格征定部门可以通过调整和制定资源型产品和最终产品等手段,刺激新兴绿色型产业发展壮大<sup>[14]</sup>。

### (三)加大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和推广力度,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九五”规划期间,我国就提出了经济的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长期以来,我国以要素和投资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并未改变。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并于今后的3—5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家。面临巨大的国际社会压力和新格局的产生,我国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生产要素成本的抬高以及资源环境问题对经济的束缚不断加剧,想要突破这些难题,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就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和升级。从长远来看,伴随规模化发展,低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的新兴绿色产业将有望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和谐相融。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将大大减少对煤炭资源的过度依赖,将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约78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2亿吨;至2020年我国对新能源产业的直接投资额将累计到5万亿元,每年产值增加额为1.5万亿元,新增社会岗位达1500万个。总体来看,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因此,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对新兴绿色产业的技术投入,以技术为强有力支撑,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这对于提升我国产业产品附加值,加快产业绿色转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抢占未来全球经济竞争制高点有着深厚长远的意义<sup>[15]</sup>。

### (四)增进与发达国家及金砖国家的绿色合作,增强国际间交流

伴随技术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使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下降,我国传统行业在国际上竞争力正慢慢消失,“世界工厂”的优势也逐渐丧,这要求一方面,我国应加快产业绿色转型步伐,开展符合我国国情的详细的绿色经济发展计划,制定以循环和低碳为重点的绿色经济战略;提高绿色发展意识,充分认识到只有走绿色发展道路,才能避免在下一轮的国际竞争中陷入被动局面;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为绿色产业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只要辅以适当的政策支持,就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在进一步与国际社会接轨中,为积极应对发达国家以环保和绿色标准为名设置的绿色壁垒和贸易屏障,必须大力研发新技术、开发新能源,发展附加值高、竞争能力强的新兴产业,加大对绿色领域的投资;加强与发达国家间的绿色交流与合作开发,加快对外投资与合作步伐,重视国际社会环境保护工作,积极履行国际社会责任,制定共同发展目标,实现互利共赢<sup>[16]</sup>。

当前,全球面临粮食短缺、能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等诸多压力。在此背景下,绿色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十分重视的议题,同时也是各国实现经济转型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选择和战略措施。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绿色经济转型作为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引擎,成为全球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新浪潮。面对当今世界格局,谁掌握了绿色先进技术,谁就掌握了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及经济话语权,谁的竞争力就越强。我国将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实现环境发展战略目标的根本保障,大力提倡依靠绿色化的力量实现产业转型、实行绿色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以节能环保来优化资源配置,将有助于提高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顺应中国经济新常态及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趋势。

#### 参考文献:

- [1] 李建平.二十国集团(G20)经济热点分析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189-213.
- [2] 李政熙.五大发展理念的价值诉求探析[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7(9):13-15.
- [3] 陈银娥,高红贵,等.绿色经济的制度创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84-117.
- [4] 邓继海.绿色经济代表新常态下的发展方式[N].中国经济时报,2016,10(016).
- [5] 解保军.经济新常态—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契机[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79-86.
- [6] 彭斯震,孙新章.中国绿色经济的主要挑战和战略对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1-4.
- [7] 李亚楠,郭元飞.浅析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绿色经济[J].商,2016(2):275.
- [8] 张梅.绿色发展:全球态势与中国的出路[J].国际问题研究,2013(5):93-102.
- [9] 梁娟.新常态下山东经济绿色发展的策略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5(21):486-487.
- [10] 董战峰,毕军.绿色化国际经验的启示[J].唯实,2015(10):55-58.
- [11] 李鹏辉.吴敬琏:经济“新常态”对绿色经济转型是挑战更是机遇[J].世界环境,2015(4):16-17.
- [12] 李鹏辉.绿色经济助力中国经济转型《绿色经济:联合国视野中的理论、方法与案例》[J].世界环境,2015(4):91-92.
- [13] 武励锋.发展绿色经济推动龙江经济转型升级[J].现代经济信息,2015(12):446.
- [14] 俞海,任子平,张永亮,高国伟.新常态下中国绿色增长:概念、行动与路径[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5(1):7-10.
- [15] MEWICKEN L, JANZ A, ROTH S. The German R&D Program for CO<sub>2</sub> Utilization——innovations for a green economy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6(11):11386-11392.
- [16] MCAFEE K. Green economy and carbon markets for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 critical view[J].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2016(3):333-353.

## China's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New Normal

LIN Xinyao, GONG Enkang, FANG Z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slowing down, energy resources being scarce, and the capac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pped. In this context, green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demand and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big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 that was put forward in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green development will be conducive to further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optimizing the energy structure,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maintaining social balanced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barriers, such as imperfect legal system, seriously damag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ollution,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people's weak green consciousness, etc., exist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a's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normal. Based on the above, the writer suggests carrying out the reform on the traditional extensiv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perfecting the green policy mechanism, optimizing the energy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green industry, strengthening the gr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green concrete measures to promote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us to ensure the economy can have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ontext of new normal.

**Key words:** the context of new normal; green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魏 霄)